

【研究討論】 Research Note

日本人思想中的中國革命傳統 ——論其再生與消逝[§]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Japanese Mindset: The Rebirth and
Disappearance

馬場公彥

Kimihiko BABA^{*}

廖欽彬^{**}譯

§ 本文初稿發表於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崛起中的日本與韓國研究整合平臺」主辦「東亞傳統文化與現代政治經濟關係」討論會（臺北：臺灣大學，2011年9月22日）。

* 日本岩波書店株式會社編輯局副部長。

Senior Managing Editor, Iwanami Shoten.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Chin-ping LIAO,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fo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壹、前言——同時代的革命言論

冷戰終結，全球化發展的一九九〇年代以降，日中之間的情報、人、資金、物資的往來日益頻繁，貿易額無論在進口或出口上都不斷在增加，相互依存關係也越加地深化。然而，國民之間的相互理解不僅沒有加深，相互間的不信任反而加劇，關於領土問題與歷史認知問題，雙方的國民情感，更是起了激烈的衝突。在近代以後的日中關係裡，西洋列強在進出東方以後，日中雖然幾乎被置於相同的國際環境，並共同擁有歷史的現實，但走過來的路卻不是對稱的軌跡。

另一方面，日中相互的認知，彼此不同，如近年來日中歷史共同研究中所見的，即使是處理相同的歷史事件，日中歷史記述的內容卻很難有一致性。無論如何正確且豐富地堆積在中國發生的事實，日本人如何認知這些事實又是另外一種問題，而中國人如何認知日本事情的線索，也無法從該處取得。

日本人如何掌握及認識鄰國的中國及中國人呢？筆者特別注意到的是，從戰敗後一九四五年到中日恢復邦交的一九七二年為止的斷交期這二十七年間，在日本國民對中國輿論的形成裡發揮重要領導作用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中國論。筆者收集了在日本發行的綜合雜誌共二十七種（揭載於其中的中國相關的報導總計2,554篇），並針對這些報導內容進行言論分析。關於中國論作為一種公共言論流通在日本社會之中並成為輿論，以及在日本人之間形成何種中國圖像這一問題，筆者也針對這些隨著歲月經過所產生的變化做了追蹤，並將各個雜誌揭載的中國相關報導中的常年變化製成圖表，另將投稿人的屬性及其變遷製成概念圖。¹

1 參見馬場公彥：《戰後日本人の中國像——日本敗戦から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まで》（東京：新曜社，2011年），頁52、411。以下本文的引用以馬場公彥：《中國像》略稱。

本文以拙著的敘述為基礎，將範圍擴大，以論壇與學術界的言論動向為線索，來探究長達一世紀的近代中國認識之軌跡。此時將把關於「中國革命」的日本人言論作為焦點。因為「革命中國」圖像就如同即使在其以外的中國事情理解上也會發揮給予人一些印象的作用那樣，長期強烈地規定著日本人的中國認知框架。筆者將以「中國革命」的相關言論為線索，探尋近代日本人中國圖像的形成與變化之過程。

貳、辛亥革命的同時代認知——失敗的革命²

從現在算起剛好一百年前，在一九一一年發生了辛亥革命。正當那時，日本經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勝利後，改元為大正，不僅推翻藩閥政治，還推動了以憲政與民主主義之實現為目標的社會運動。這同時也是女性解放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等新思想開始興盛，在國民之間開始廣泛滲透的時期。

當時的日本人稱中國南方「革命派」引發的鄰國之武力揭竿起義為「支那革命」、「革命動亂」等，在受到清朝被推翻這一衝擊下，將其和自國採取立憲君主制的明治維新體驗相比較的同時，認為他們選擇立憲共和制這種政體所進行的革命是一種「共和革命」。

經過武力革命後，穩固、安定的統一權力究竟可不可能成立？其權力該由以孫文為中心的南方革命派來掌握？還是該由以袁世凱為核心的北方派來掌握？日本人觀望革命的變化，思考是該靜觀其變？還是該參與其中？若是參與的話，是該跟隨北方派？還是南方派？等問題。不久革命派將總統位置拱手讓給袁世凱，再次起義也宣告失敗，其成員因此陸續逃亡到日本，袁世凱藉機傾向復辟帝制，在此情況下，革命前途無望，「革命

2 本節是以馬場公彥〈辛亥革命を同時代の日本人はどう見たか——日本で發行された雜誌を通して〉（收於《アジア遊學》〔東京：勉誠出版，2011年〕）為基礎的內容。

已胎死腹中」的看法逐漸濃厚，革命和共和根本沒有深植在中國人的國民性和中國的傳統這種議論，已經逐漸佔了優勢。³

日本經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後併吞朝鮮，並確保了「滿洲」權利的一部分。西歐列強經第一次大戰在歐洲戰線當中呈現疲憊狀態，在中國的列強勢力逐漸減弱之際，日本從領土保全、不干涉靜觀論，轉變成領土分割、積極參與論，並展開「滿洲」領有論、⁴東蒙古進出論、⁵長江流域經濟進出論。⁶

支持這種日本對外擴張政策與行動的是，甲午戰爭勝利以來輕蔑、侮辱中國、中國人的國民情感，以及踩在從琉球合併到日俄戰爭勝利的過程中，首先將琉球納入版圖，接著佔領臺灣，最後合併韓國這些擴大國內及海外殖民地的現實，來確保滿蒙與對中國本土進行侵略的欲望。很多日本人將辛亥革命理解為，到當前為止的中國史中的禪讓——放伐的傳統革命類型，或者是用其與各王朝末期的民眾反亂之間的類似性，來理解革命派的動向等，而以中國史的連續性框架來掌握的傾向特別顯著。其結果，則將革命的活力作為民族性本質還元論來理解，透過「宗族主義式的個人主義」、「深思熟慮的經濟主義」這些固定思考模式，來掌握中國人的國民性，最後導出了「支那一點都沒有改變」的印象。⁷

在這當中，歷史學者白鳥庫吉注意到的是，辛亥革命與到當時為止的王朝交替之間的非連續性與劃時代性，並認為連繫到近代的「思想上的革命」已經開始發生。白鳥直言道，此次革命的真正原因「不外乎是激烈改革的新思想與原來的舊思想之間的衝突」，目前的混沌、紛擾都是為了成為「某種帶有中央集權，能和世界列強並駕齊驅之國家」的「第一步」。⁸

3 〈支那第2革命の失敗〉，《中央公論》，1913年秋季大附錄號（1913年），「社論」。

4 高橋作衛：〈清國領土保全の意義〉，《外交時報》，第157號（1912年2月15日）。

5 矢野仁一：〈蒙古に於ける支那と露西亞 上下〉，《新日本》，第3卷第11、12號，（1912年10月、11月）。

6 犬養毅：〈南方支那は世界列強競争の天王山〉，《新公論》，第28卷第4號（1912年4月）。

7 茅原華山：〈新しく觀たる新しき支那〉，《中央公論》，1913年8月號（1913年）。

8 白鳥庫吉：〈支那歴代の人種問題を論じて今回の大革命の真因に及ぶ〉，《中央公論》，1911年12月號（1911年）。

當時還是早稻田大學校長，之後當上首相，對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的大隈重信，當初並沒有在原來的傳統革命觀延長線上，來掌握辛亥革命。他說道：「未曾出現過的歐洲文明思想給予了支那很大的刺激，這使得支那人感到有必要改造國家的政治組織。」⁹

參、國民革命的同時代認知 ——被忽略的「抗戰建國」之現實

一九二六年，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下，由於以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而得以脫離軍閥混戰的情況，隔年，作為統一政權的南京國民政府正式成立。在這期間，以近代民族國家的建設為目標，「國民革命」開始被發起。其後，經過國共分裂、關東軍的「滿洲」掠奪、「九一八」事變下的「滿洲國」建國、以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變為契機轉變為「一致抗日」的第二次國共合作、因盧溝橋事件所引發的中日戰爭等，國民黨開始將全面性的「抗戰建國」揭示在綱領中。在歐洲爆發世界大戰，日本軍偷襲珍珠港引起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中國作為聯合國的一員，將抗日戰爭定位為世界戰爭中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

在這之間，國民黨提出了從「訓政」轉移到「憲政」的國家建設綱領，並實踐了新生活運動等革命運動。共產黨則透過在邊境建設根據地與進行土地革命，提出農村包圍都市的武裝革命。國共雙方的革命模式雖然有所不同，但在抗日戰爭當中，不以諸政府的林立狀態或日本的傀儡政權，而以近代統一國家的建設與國民經濟發展為目標，在全國各地展開民族主義運動。¹⁰

9 大隈重信：〈支那革命論 再び〉，《新日本》，第1卷第10號（1911年12月）。

10 野村浩一：《蔣介石と毛澤東—世界戦争のなかの革命》（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野村浩一、近藤邦康、村田雄二郎（編）：《國家建設と民族自救—國民革命・國共分裂から一致抗日へ》（東京：岩波書店，2010年，新編 原典中國近代思想史5），解説（執筆者：野村浩一）；野村浩一、近藤邦康、砂山幸雄：《救國と民主—抗日戦争から第2次世界大戦へ》（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新編 原典中國近代思

另一方面，日本對中國進行的是，從九一八事變到中日戰爭的擴大戰線，此戰線的實態是將「滿蒙」從中國本土中分離出來，其次是分離華北這種領土分割或併吞，並以「輔車唇齒」、「日支合作」、「日華親善」、「東亞共同體」、「東亞新秩序」等美名來模糊侵略的事實。很多日本人雖然強調在傳統上對中國抱有文化的親近感，但實際上卻表露出中國近代化的落後、國力的貧弱，是來自其國民性這種侮蔑感。然而，戰爭的長期化，中國方面的抵抗則顯示出堅強的戰略組織性。當時大多數的日本人誤判了中國抗戰能力的實態，幾乎沒有認知到隨著戰爭國民黨政權和中國共產黨雙方主導的革命正在進行的現實。

若注意到當時發行的綜合雜誌與中國專門雜誌所發表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中國論中認識中國的方法，可發現站在把作為大陸帝國的日本之國際地位視為理所當然，「支那並非國家」這種前提，將侵略與傀儡政權樹立所帶來的殖民地化給正當化，是佔大多數的主流言論。另一方面，從一九三六年到盧溝橋事件之間，以細川嘉六、中西功、戶坂潤、尾崎秀實、鈴江言一、尾崎庄太郎、大上末廣等馬克思主義者，蠟山政道、矢內原忠雄這些自由主義者，有吉明、齋藤隆夫等政治家或官僚，以及大西齋、山本實彥、村上知行等新聞記者為中心，除了有展望中國的民族與近代國家的統一以及民族資本的經濟建設之「支那統一化論爭」的言論，還有改變對中國現況的認知，並提示能建議重新審視大陸政策的「支那再認識論」的言說。¹¹

另外，就如新聞記者兼中國研究專家的橘樸所言，亦有人分析中國農民、行會、鄉紳層等在地社會的基層組織，透過區域社會自治及藉由從下而來的連帶與協同，形成近代國家這種「國民革命」的動態。¹²國策會社滿

想史6)，解說（執筆者：砂山幸雄）。

11 關於日中戰爭期的「支那再認識論」、「支那統一化論爭」，參閱西村成雄：〈日中戰爭前夜の中國分析—「再認識論」と「統一化論爭」〉，收於《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3卷，《東洋學の磁場》。

12 野村浩一：〈橘樸—アジア主義の彷徨〉，《近代日本の中國認識—アジアへの航跡》（東京：研文出版，1981年）；酒井哲哉：〈アナキズム的想像力と國際秩序—橘樸の場合〉，《近代日本の國際秩序論》（東京：岩波書店，2007年）。

鐵的調查部在一九三九年所進行的「支那抗戰力調查」，雖然正面評價中國的民族主義力量，並預測了日本軍的撤退，但此調查被東條首相一手遮蔽，因此沒有被公開。

肆、日本的戰敗與新中國認知途徑

一九四五年日本的戰敗，亦是讓人察覺到上述對同時代中國錯誤認知的契機。不要說被解除武裝的軍部被視為軍國主義的元凶，就連強調中國社會的停滯性且不脫傳統中國觀的「支那學者」、一直在流傳落後性與侮蔑性印象的「支那通」，甚至是針對土地改革與中國共產黨的支配區域沒有做完整情勢調查的當地調查研究員，不僅沒有注意到民族意識與抗日意識的高漲，還製造出「日支親善」的欺瞞性幻想，並增強侮蔑性印象，因此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在支那學者當中，有人反省原有的「漢學」或「支那」學式的中國觀，並注意到中國革命的歷史劃時代性，亦有人提出新的研究視角與認知框架的建構。譬如，《世界》（岩波書店發行）一九四九年八月號特集「如何看中國的現狀——支那學者的答案」中，松本善海在「中國的苦悶與中國研究者的苦悶」中以「對過去中國的尊敬與現在中國的侮蔑，隱約地結合在一起」的現狀為基礎，如此披露自我批判式的反省之言。「特別是我們的情況，必須要有勇氣踏出儼然存在的窗簾之外。若能有一次踏出其外的話，決定我們那些藉由舊的中國研究所建構出來的學問整體是否正確的，只有活生生的中國現實情況而已。因此若其現實情況有背叛我們的話，我們也只能乾脆地改寫我們的歷史。」¹³

代替這些人最受到注目的是，作為能將同時代中國之現狀與前途活生生傳達的情報源。這些情報源首先包括，從以延安為中心的中國共產黨支配地域歸還的原俘虜士兵們，以及在戰爭結束時在延安日本人解放連盟中的二二三名日本人。¹⁴因為他們與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活動直接接觸，因此

13 馬場公彥：《中國像》，頁87-89。

14 香川孝志〈捕虜から反戦兵士へ〉之解說，見《季刊現代史》，第4號（東京：現代史之

其情報價值非常的高，他們開始主張抗日戰爭與中國革命的正當性。除了這些人之外，屬於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與東北滿鐵調查部員等的日本共產主義者們，從中國歸還後，亦開始積極地揭載中國相關的報導。

戰爭結束後，由於實地調查與研究中國的機構被關閉，因此產生了研究上的空白。在此情況下，戰時中屬於亞洲調查、研究機構，並參與社會主義運動的日本共產黨員的中國研究者等齊聚一堂，於一九四六年一月設立了屬於民間研究所的中國研究所。¹⁵根據筆者的調查，一九四五至五〇年之間被發表的中國相關報導，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此中研所員所撰寫的。¹⁶

第二個受到注目的新情報源是，在中國能進行採訪活動的歐美親中派記者、研究者們及外國通信社的通信報導。主要的執筆人有埃德加·斯諾、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傑克百通、歐文拉鐵摩爾等人，這和中研所員的情況一樣，在一九四五至五〇年期間被揭載的中國報導當中，外國人的報導佔了三成多。¹⁷

在日中戰爭中，和中國有直接接觸的日本人論者，在戰敗後，開始自問日中戰爭的敗因，為何日本軍會敗給在軍事上完全處於劣勢的中國，並對中國充滿侮蔑的認知方式做了反省。而且隨著深感對中國侵略的迫害責任以及贖罪意識，在接受波茨坦宣言放棄武裝後，卻又害怕中國軍的報復，然而接到在戰爭結束當天放送蔣介石總統不用武力來報復的聲明後，又對中國政府的寬容做法感到有恩情。¹⁸

當然這些人亦對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抱有贖罪與恩情的心態。然而，在戰敗後的美軍佔領下，卻不得不接受美軍民間檢閱局（CCD）的檢閱制度。根據新聞規範，必須承認「大東亞戰爭」，至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會，1974年8月）。

15 末廣昭：〈アジア調査の系譜—滿鐵調査部からアジア經濟研究所へ〉，收於《岩波講座：「帝國」日本の學知》，第6卷，《地域研究としてのアジア》。

16 馬場公彦：《中國像》，頁86。

17 馬場公彦：《中國像》，頁74。

18 馬場公彦：《中國像》，頁100。

（東京裁判）的批判性報導等則不被允許揭載，右派的保守言論空間變得極為狹窄。¹⁹

另外，非軍事化、民主化變成首要課題的佔領政策，轉化為和平日本的象徵，並隨著變成「國民統合象徵」的天皇制一同成為戰後日本重建的基礎。此時，日本的殖民地化由軍方來主導，由於「殖民地化與軍事化之間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脫殖民地化被視為非軍事化的一環，脫殖民地化這個固有的時刻也遭受到遮蔽，且更因美國的冷戰策略而被凍結。²⁰在此背景之下，被日本佔領半世紀，且擁有特殊歷史經緯的臺灣及其住民的存在，因而從眼界消逝。事實上，從一九四五到五〇年這段期間，日本人自己的臺灣相關報導幾乎是沒有，幾乎所有報導都是被允許在臺灣當地採訪的西方記者之產物。²¹

伍、中國革命的同時代認知——「新中國」圖像及其搖擺

即使在國共內戰，當初雖然是國民黨這一方在軍事上佔了絕對的優勢，但此種偏重左派的中國認知框架一直繼續維持著，政權的正統性在共產黨這一方這種言論反而極佔優勢，所有的注目也集中在土地改革與勞農階級的動向上。當人民解放軍轉為攻勢，國民黨政府的崩潰轉為現實，美國杜魯門政權切斷了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並決定不介入國共內戰的政策。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國國務院發表大部的《中國白皮書》（*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嚴厲批判國民政府的失敗，與此書刊行的同時日譯本也跟著出刊，這給日本的論壇帶來很大的衝擊，由於國民黨的腐敗、墮落、人民離反的負面印象，造成加速擁護共產黨的傾向。²²

19 關於CCD的雜誌檢閱，參照山本武利：《佔領期メディア分析》（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96年）。

20 三谷太一郎：〈戰時體制と戰後體制〉，收於《近代日本の戦争と政治》（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頁75-76。

21 馬場公彦：《中國像》，頁111-113。

22 馬場公彦：《中國像》，頁117-118。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對日本而言，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做為一個主體，將日本這一帝國主義、法西斯勢力從中國全領土驅逐出去。其透過土地改革提升勞農階級，打敗接受美國支援的國民黨軍，並樹立一個新的統一國家。中國共產黨被視為擔任統一政權的正統權力，以農民為主體的「中國革命」與清新的「新中國」印象，逐漸深植在日本人的印象當中。

然而國際情勢迫使東西對立局面更加尖銳化，相對於美國開始明確化對蘇反共陣營所建構的遠東戰略，中國則藉由來自蘇聯的物質與技術的援助，逐漸地將「清白中國」的印象轉變為「紅色中國」。正當日本準備脫離美軍佔領回到國際社會的時候，被迫面臨透過和西方部分講和加入反共陣營，或面臨包含社會主義圈的全面講和這兩種政治性抉擇。多數的中國論者主張全面講和下的平和共存，並批判日本的「對美一面倒」及再軍事化，而部分講和論者則對中國「對蘇一面倒」與「革命輸出」所帶來的日本共產主義化抱持著警戒。

一九四六年九月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爆發，一九五〇年六月爆發朝鮮戰爭（於一九五三年七月休戰），一九五四年人民解放軍砲擊金門、馬祖引起第一次臺灣海峽危機，印度支那半島和朝鮮半島被分割成南北，隔著臺灣海峽形成「兩個中國」，以此為舞臺的國際對立結構，逐漸顯露出來。一九五四年十二月，臺美相互防衛條約成立，當美中軍事對決逐漸帶有現實意味時，在日本論壇上臺灣的存在作為外交、安保上的焦點，也漸漸地受到矚目。

和新中國的「紅色中國」不同的另一個面貌是，打倒西洋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確立經濟的獨立自主，改革封建社會制度這種以民族解放為目的的亞、非洲新興國家領導型的存在感。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尼萬隆的第一回亞、非洲會議中，周恩來打了一場漂亮的初次外交勝仗，與印度首相尼赫魯一同主張非同盟中立、和平五項原則。日本論壇再次以日本別成為「亞洲的孤兒」的口號來呼籲，不應該追隨美國，也不應該被社會主義化所染，必須站在中立主義的立場選擇和亞洲新興國家和平共存的一條

國際社會復原之道。代表此時期日本的時代精神口號是，「民族與和平」。

一九五八年發生第二次臺灣海峽危機，在日本，對中國和臺灣的局部戰爭是否會演變成美中的全面戰爭充滿了不安。²³隨著「兩個中國」論登上論壇的是，關於臺灣住民自決權的臺灣獨立論。²⁴一九五九年三月面對西藏武裝動亂，人民解放軍出兵鎮壓，八月和一起主張和平五項原則的印度之間因領土問題，發生了武力紛爭。在越南戰爭擴大化中，中國於一九六四年十月開始進行核試驗，企圖藉此成為亞洲第一個擁有核武的國家。如此一來，中國清新的和平國家形象就此破滅，世界也開始對中國揭示的「和平共存」感到非常不安。

此外，一九五六年三月以赫魯雪夫的史達林批判為契機，發生波蘭事件與保加利亞事件，隔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中，毛澤東做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報告，引起了中蘇論爭。日本的革新勢力在不明該支持中蘇哪一方的情況下，為中蘇對立所左右，其對社會主義的信賴也開始產生動搖。

即使在中國國內，社會主義化的方針還是以一九五三年的過渡期總路線來加以表示，一九五八年當社會主義總路線被採用時，大眾動員型的大躍進運動也因此而得以被推動。建國當初的整風運動是原本為了把人民思想改造成「新中國」的新人類之再教育的嘗試，然而因三反五反運動、胡風事件、反右派鬭爭等的展開，隨著其大規模化、過度激烈化，繼而被視為是封殺自由思想的肅清運動。

23 《世界》1958年11月號緊急籌畫「臺灣海峽の緊迫と日本」這個特集。

24 作為臺灣住民自決論的先驅報導有廖文毅〈祖國臺灣の運命—蔣政權をセント・ヘレナに流せ〉，《文藝春秋》，1955年4月號（1955年）；作為給予日本論壇衝擊的報導有邱永漢：〈臺灣人を忘れるな〉，《中央公論》，1957年8月號（1957年）；〈1つの中國・1つの臺灣—「2つの中國」はあり得ない〉，《文藝春秋》，1958年10月號（1958年）；〈臺灣は必ず獨立する〉，《文藝春秋》，1961年5月號（1961年）；作為臺灣獨立論的明確主張例子之一有王育德：〈ある臺灣獨立論者の主張〉，《世界》，1962年4月號（1962年）。

陸、文化大革命的同時代認知——其衝擊與波紋

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決議」（1981年），文化大革命是指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七六年十年的這十年。在此期間，作為激烈社會大眾運動以全國性規模擴展的是到一九六八年為止的這三年，年輕的紅衛兵走上街頭高喊「打破四舊」，並將毛澤東神格化，伴隨暴力的造反運動也開始激烈化。之後的七年，年輕人被命令下鄉，因此分散在全國的偏僻農村，青年們被迫保持沈默。²⁵

日本方面，一九六六年三月，日本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決裂，使日本的中國相關友好團體、學術機構，相繼出現中國派與反中國派的深刻裂痕。一九六八年以降，反日本共產黨系的學生運動與紅衛兵群集武鬪的熱狂同調，對中國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安保改定反對鬪爭（安保鬪爭）的支持等中國方面的宣傳，表示過度的反應。大學校園鬪爭在世界達到一個高點，給予了日本論壇與社會運動莫大的影響。就像對當時的中國人而言一樣，文革對那些火爆的日本年輕人而言，亦是「觸動人們靈魂的大革命」。²⁶

與此同時，對當時的日本人而言，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充滿迷團，是前所未聞的事件。若從辛亥革命以降的中國革命傳統來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透過選擇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革命就應該算是成功了，若是如此為何有再革命的必要呢？究竟此革命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權力者之群眾動員，還是由下自發性發起的大眾運動呢？相對於中國革命是以農民為主體而發起的農村革命，文革則是以像紅衛兵那樣的學生為主體的都市革命，然而這是從中國革命的脫離，還是在其延長線上的新開展呢？很多日本人，針對文革的功過有許多論戰。²⁷

25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x-xi。

26 《人民日報》，1966年6月2日，「社論」。

27 關於文革論的變化，參照馬場公彥：《中國像》，頁257-269。

到了一九六九年，學生運動開始恢復平靜，大學被大眾消費社會的狀況所埋沒，文革的燎原之火也隨之消退。然而其並沒有完全被澆熄，毛澤東的革命論不僅波及到新左翼的世界革命論與激烈的武裝鬭爭，還波及到在日朝鮮人、在日華僑的民族歧視之糾彈與獲取權利之鬭爭。在論壇與學術界中，則出現了一種對中國革命重新審視的新動向，也就是一方面比較日中近現代史，另一方面反省日本的中國侵略，並從內在思考對中國而言的近代意義的新動向。²⁸

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九全大會中，林彪被公認為是毛澤東的繼承人，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企圖暗殺毛澤東發起政變，但最後卻被發覺終告失敗，其死因不詳。此林彪事件對所有日本人而言，亦是一件令人匪懈的事件。由於有將近一年的真相沒有被報導，文革支持者們開始沈默，中國研究也因此而停滯不前。接著一九七二年二月，和毛澤東信奉者有關的日本連合赤軍，造成挾持人質的山莊槍擊事件，被逮捕後，有十四名同志被殺害的事實曝光。接連林彪事件之後的連合赤軍事件發生後，新左翼運動也自然瓦解，把毛澤東主義作為世界革命思想來學習的契機已然消失，對文革的狂熱與陶醉感也急速冷卻。

周恩來、毛澤東相繼辭世，文革落幕之後，文革的權力鬭爭、驚人的暴力、破壞的實態也傳到日本來。中國在一九八一年六月的「歷史決議」中，全面否定文革，還封鎖資料，甚至禁止歷史事實的詳述，直到今日為止。在日本，除了近現代中國研究者外，一般人對「中國革命」已不再關心。姑且不論文革支持者是否應該接受批判，他們對文革期自身的發言卻保持沈默。因此，關於文革論議的實質內容，同時代的見證人至今仍然很缺乏，回顧性研究的嘗試亦不是十分完備。²⁹

28 關於論壇文革期的「內なる中國革命論」，參照馬場公彥：《中國像》，頁297-305。

29 馬場公彥在《中國像》第4和5章中試圖挖掘出日本的文革論。

柒、中日邦交的恢復與未解決的歷史問題

文化大革命尚在如火如荼進行的一九七一年七月，美國總統的輔佐官季辛吉秘密訪中，與周恩來總理、毛澤東主席會談，並閃電宣布尼克森總統即將訪問中國。同盟國美國在沒有任何商討與預告的情況下公開訪問敵國，此事對日本政府和外務省而言，可說是晴天霹靂。對支持文革的日本人而言，美國實是美國帝國主義，對中國來說是最大的敵國，然而首腦的公開訪問卻令人無法理解。以此種美中的親近為契機，日中邦交恢復的工程也開始有了進展。在隔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森訪中之後，九月二十五日，田中首相訪中，並發表日中共同聲明，最後日中邦交正常化，自邦交正常化的一九七一年到隔年，日本論壇發表眾多有關邦交正常化的報導，在綜合雜誌揭載的中國相關報導，就佔了三分之一。³⁰

綜觀這些日中恢復邦交論的傾向，大可分為從國家利益論的見地現實主義式地建構議論的實利派，以及從贖罪論的見地理想主義式地建構議論的道義派，在報導篇幅上兩者幾乎可以分庭抗禮。當中道義派報導的大部分都支持日中邦交的恢復，實利派報導的大約三分之一支持恢復邦交，其餘的保留判斷，對於恢復邦交不是採取消極態度，就是持反對立場。關於實利與道義這兩種論調的區分，即分別屬於戰後講和論中的部分派與全面派，繼承的形式幾乎沒變，而以這兩種區分來論述恢復邦交的是與否，是當時的實際狀況。

在日中首腦的外交交涉中，日中雙方的國家利益調整這種勢力均衡論，被放在主要文脈上，相對於此，終結日中的戰爭狀態並處理戰爭責任問題這種道義理論，則被放在次要文脈上。日本方面，雖然被迫面對與臺灣斷交的痛苦抉擇，但臺灣問題卻被擱置沒有得到解決，戰爭責任問題因中國方面同意放棄賠償要求，在表面上得到了解決，但關於任何一個謝罪

30 馬場公彥：《中國像》，頁321。

文，都不能說是已盡侵略中國的道義責任，其只不過是一種不徹底的反省而已。³¹

在論壇中，自一九七一年的日中恢復邦交論以來，關於戰爭責任論、謝罪論、賠償論，日本沒有侵略戰爭的責任，完全沒有侵略的事實這種反中國的報導，經常出現在《諸君》（文藝春秋社），《正論》（產經新聞社）等雜誌版面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在日本被發行的綜合雜誌中，當然到當時為止，已揭載了不少對中國現況進行批判的報導。然而，這些批判性的報導大多數都是以批判中國共產主義與毛澤東主義為基礎的東西，像批判中國這個國家，以及在中日戰爭當中主張日本無罪這類的報導，從沒有被揭載在雜誌封面上。有關八十年代以降的歷史教科書問題、九十年代以降的自虐史觀批判、靖國神社正式參拜、「從軍慰安婦」問題等歷史認識論爭的淵源，存在於日中邦交恢復時期的反中言論之中。

捌、從日本人視域中消失的中國革命傳統

對近代的日本人而言，歷經百年的「中國革命」圖像，是包含辛亥革命（1911年）、國民革命（1924年）、中國革命（1949年）及文化大革命（1966年）的綜合圖像。在橫跨四個階段的中國革命開展中，每個階段都會為其前階段的革命圖像帶來變化，而此「革命中國」圖像就在被重構的同時也被繼承了下來。在這一層意義上，對近代以降的日本人而言，「中國革命」圖像，作為中國對應外在環境變化，自主性地選擇民族與國家之道的模式，一直規定著近現代中國的認知框架。在這個意義上，一直到幕末維新期為止以儒教文化為中心的古典中國文化傳統，雖然還是被日本人所繼承，但「中國革命」圖像替代其地位成為思考中國的新模式。在這個意義上，對日本人而言的「中國革命」圖像，作為一個新傳統已在生根。

31 關於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首腦交涉過程，參照石井明、朱建榮、添谷芳秀、林曉光（編）：《記錄と考證 日中國交正常化・日中平和友好條約締結交渉》（東京：岩波書店，2003年）。

文化大革命落幕，日中也恢復正式的外交關係，一九七八年雙方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同年末，在十一期三中全會中國正式聲明改革、開放政策的轉向，藉此與世界接軌。改革開放的浪潮，因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門事件一度停滯，但因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改革開放，又再次加速前進，與全球化的世界潮流連成一體，形成不可逆轉的局勢。在日本，學生運動與新左翼運動開始平靜化，大眾消費與個人主義進入社會，群集的反體制運動風潮也跟著消退。日中關係開始正常化，中國自身亦透過改革政治經濟體系，來擴大前所未有的日中之間人、情報、物資的往來，直到今日為止。

經過這種大轉換，將「中國革命」作為日本問題並從內部來掌握這種同時代認知，在今日日本人之中已逐漸在消逝。對現今日本人而言的中國圖像，是外部客觀觀察的對象，在論壇上，近代以降的多元中國論的論者已退出論壇，幾乎都被歸類為能熟稔中文，善用豐富資料與專門知識的中國觀察者。在學術界，革命以前的傳統古典中國圖像，仍舊存續在「古典中國學」的文獻世界當中，現代的中國作為區域研究的「現代中國研究」論者進行調查、分析其實態的對象，被做了研究者以及學會（處理古典中國的「日本中國學會」與處理現代中國的「現代中國學會」）的區分。關於「中國革命」，其只不過是古典與現代之間的中國史研究者的研究領域而已，並沒有特定的學會。³²

玖、結語——須重探革命史觀

近代日本與近代中國共同渡過同一個時代，不僅沒有真正把握「中國革命」的現實與意義，對中國抱持輕蔑觀的同時還侵略中國，甚至一直誤判了中國人民抵抗的力量。從此反省，戰敗後的日本人，開始形成與展開以「革命中國」圖像為基礎的近代及同時代的中國認知。然而，中國自身

32 飯島涉：〈「中國史」が亡びるとき〉，《思想》，第1048號（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8月），頁109-110。

轉向改革開放政策，在後冷戰與全球化的世界情勢中，「革命中國」圖像有了很大的變化。中國的自我認知高度評價從對歐美列強的抵抗以及對日本軍的抗戰，到「新中國」建國這一連串革命事業，此「革命史觀」現今仍然存在。與此同時，就如同和「革命史觀」對峙一樣，強調吸收外來文化，以近代化為目標，改良舊有的國家體系的過程，也就是所謂以「近代化史觀」為基礎的歷史認知動向，不斷在增加其勢力。此種「革命史觀」與「近代化史觀」正處於將歷史學界與歷史教育界一分為二的對抗狀態中。在論壇，則出現了「告別革命」的聲浪，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後的革命歷史拖延了中國的近代化這種全面否定中國革命的議論。³³

在那種歷史認知變化的氛圍下，即使在日本，以一直規定著日本人中國認知的革命為基軸之中國圖像也開始產生了很大的變化，如今中國革命的評價在下滑，中國革命的記憶被遺忘，長期規定日本人中國認知的「中國革命」圖像，不斷在消逝。³⁴

難道我們只要把辛亥革命以降的中國革命傳統，視為對近代化而言的阻礙要因，並將之遺忘就可以了嗎？相對於那種日本人一般的風潮，在最近的中國，則開始有將近代革命經驗納入，以此建構一個新的近代中國圖像這種學術性嘗試的展開。針對這種處理的實例，在此筆者想舉出兩個例子。

第一，建立一個「初期近代（early modern）」的概念，一方面援用「帝國」概念，另一方面把中國近代化的過程視為從清帝國體系到近代體系的「中國化」變遷來掌握，並把它視為傳統帝國觀、世界觀、歷史觀所支撐的文明體系之再定位。此是代表清華大學汪暉教授的看法。³⁵在那裡，

33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香港：天地圖書公司，1995年）。

34 關於中國與日本對近代中國歷史認知的變化，在野村浩一、近藤邦康、並木賴壽、坂元ひろ子、砂山幸雄、村田雄二郎（編）：《新編 原典中國近代思想史》（東京：岩波書店，2010年），第1卷，〈「新編」總序〉（全編集委員、編集協力）中被論及。並參照載在同卷的〈「舊編」總序〉。

35 汪暉：《近代中國思想の生成》，石井剛（譯）（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特別是〈「初期近代」ならびにその他—日本語版序文〉。原書為《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08年，第2版，全4冊）。

以土地革命為中心的中國革命、建國後的社會主義運動，甚至毛澤東思想，在配合中國獨特性的近代世界之實現這個意義上，被定位為「反近代的近代」。³⁶

第二，將辛亥革命以降的中國革命動態，作為為了實現民主政治、人權尊重、自由主義的促進要因或阻礙要因，來重新掌握這種知性的探求與社會運動。此時最重要的是民主化運動的評價，特別是八〇年代後半高漲，卻因天安門事件挫敗的民主愛國運動的評價。此民主愛國運動究竟是繼承中國革命的經驗與遺產所展開的運動？還是在否定中國革命傳統之後所展開的運動？民主愛國運動的主體雖然是以北京為中心向全國擴散的都市學生，但其上一世代的廣泛知識人、藝術家、記者、勞動者，亦都表明支持學生，並參與運動。對後文革世代的學生而言，在改革開放政策延長線上，啟蒙運動帶來西洋的政治制度與民主思想，此可說是其自我規定，文化大革命為國民帶來悲劇，被認為是讓國家發展停滯的災難。對在這之上的文革世代而言，被喚起的記憶是，文革最初是紅衛兵對既存體制的抗議，以及對既得權益者的造反運動，其或許會作為一九七六年周恩來去世後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一九七八年民主牆運動的再現而被加以定位。³⁷

從中國革命傳統的脫離，也就是「脫革命」，如今已是難以抵抗的時勢。然而，在四個革命過程中，從王朝到共和的轉移已完成，從皇權到民權的方向性也已確立，這些都使得反殖民主義、反帝國主義的思想成功地達到滲透的階段。另一方面，民主化與憲政的實施，人權與自由的實現等，至今仍留下未完成的重要課題。此外，無論四個革命中的任何一個，皆是以武力為依據所取得的權力正統性之過程，因此和平主義這種政治思想，亦是中國必須持續追求的政治課題。

36 汪暉：〈現代中國の思想狀況とモダニティの問題〉，收於《思想空間としての現代中國》，砂山幸雄（譯）（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頁10-18。本文原題為〈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37 關於參加民主化運動的人們的證言，訪談之後逃亡到海外諸國的運動家、知識人、藝術家的記錄，被收錄在翰光：《亡命 遙かなり天安門》（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

我們有必要將一連串的中國革命史實與言論，在同時代的國際環境與思想潮流當中，再加以定位，汲取經驗和教訓，並將其作為世界史的同時代認知來加以定位。其知性的建構，無論是對公共知識分子而言，或對講壇研究者而言，仍然是應該擔負的重要責任。

